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考辨

王进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2)

摘要:“历史性”问题通常被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遮蔽,也不为当代文化研究话语所重视。新历史主义提倡历史性的回归,关注文学文本的历史情境和传播过程,建构文学活动和活态历史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通过考察“历史性”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以及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同时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反思当下“历史性”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历史性;效果历史;生态意识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1-0204-04

“历史性”问题在当代学界是颇具争议的理论话题。后现代主义文化断然宣告“历史的终结”,当代文化研究思潮极力回避“历史的陷阱”,随后崛起的新历史主义争锋相对地提倡建构“回归历史情境”和“触摸历史肉身”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的“历史性”批评,西方理论家专注前现代和文艺复兴文学的历史经验,中国学者提倡文学批评的历史意识和文化精神。然而,正如盛宁先生强调:“新历史主义的批评不是回归历史,而是提供又一种对历史的阐释,可是新历史主义却始终不能消除人们心头的印象,总给人以它就是一种历史所指的感觉。”^{[1](270)}并举历史真实和主体意识的文化诗学批评,时常被指责为不是在“历史所指”层面根本解决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困境,而是在“历史能指”层面进一步加深历史阐释活动的生态问题。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究竟是作为逝去情境的历史真实,还是作为当下语境的文化想象,抑或是两者参杂的记忆空间?文化诗学意图恢复文化批评的历史意识和主体经验,却未曾预料历史批评在“历史性”问题的外表之下愈加混沌无章。为此,本文对文化诗学视域的“历史性”问题展开梳理,在历史叙述与当下主体的对话关系当中考察其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在历史建构与文化解构的学科边界之间反思它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在逝者经验与释者想象的共鸣关系当中探讨它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以此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

反思当下“历史性”研究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

一、作为“视域行动”的“历史性”

历史阐释首先表现为当代主体在文本层面对于时空情境和文化意义的整合和重构过程,其次呈现为在个体视角、群体意识和历史情境之间的记忆和回忆形式。一般来说,个体视角的记忆问题表现为历史主体的时空经验和叙事效果,群体意识的记忆问题代表着价值观念的集体经验和文化传统,历史情境的记忆问题则呈现出阐释活动的时空意识和对话观念。针对记忆本身承载的历史叙事空间,正如荷兰叙述学家米克·巴尔指出,“记忆是对过去的某种‘视域’行动,但是作为某种行动,它定位于记忆的当下时代”,因此对记忆的建构过程来说,“它通常是某种叙述行为:松散的成分集中并整合到某种故事,所以它们能够被记忆和被重复讲述”。^{[2](47-48)}正是深谙历史阐释活动的“视域行动”,或者说在记忆和回忆过程的多种叙述结构,海登·怀特强调在阐释层面的“历史多样性”,他认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探索与其说是源自建构以往事件的必要性,还不如说来自于某种欲望,以此决定某些事件对于特定人群、社会的特殊意义,或者对于当前任务的文化概念以及对于未来前景”。^{[3](480-493)}

海登·怀特之前对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的阐释

收稿日期:2012-09-25;修回日期:2012-11-13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翁伯托·艾柯迷宫文本叙事研究》(10BWW004);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庶民学派文学批评探析》(12YJA752002)

作者简介:王进(1979-),男,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

观念并未做出任何褒贬评价，但是此处却可以看出他本人所提倡的后结构主义立场，他所强调的历史多样性并不是来自于历史本质的错综复杂，而是源自对于过去历史的各种“视域行动”和叙述过程，或者说是历史意义的多元记忆视角和阐释欲望。同样是意识到历史阐释活动的记忆问题，格林布拉特也提倡历史意义的多元空间，“因为缺乏各种对象的既定群体，新历史主义变成各种可能性的历史：尽管对集体性的事物非常感兴趣，它仍然致力于单个声音，孤立事件、特殊视角、过渡时刻的价值”；然而，与海登·怀特一头扎进“元历史”叙述结构的做法有所不同，格氏主张的是从历史情境关注这些记忆行为的阐释欲望，他从文化诗学的批评视角不断强调“从始至终，我们都认为两种途径相当重要：我们希望尽可能地深入到个别历史文化的创造模型，同时我们也希望理解这些文化的某些产品如何获得某种独立自主性”。^{[4](16)}

伴随历史记忆的叙述视角，历史阐释的生态问题还表现为历史真实与文化想象之间的理论矛盾，也就必须关注和反思后现代文化的各种历史真实观念。后现代文化崇尚历史书写的边缘视角和历史阐释的多元结构，它在“重写历史”的各种理论思潮当中主张一种边缘文化的历史在场和边缘群体的权力诉求，在解构宏大历史叙述的同时不免有些矫枉过正，继而转向历史视角的身份意识和历史叙述的文化想象。正如杰金斯指出，“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启发观念已经改造了大写历史/小写历史和伦理/道德的各种观念”：在历史书写层面上，“这种二元主义现在已经皆大欢喜地瓦解，而它的瓦解也标志着‘历史要求/我们要求历史’的共同终结”；在历史阐释层面上，“对于那些个别的幻象来说，过去历史或许存在；但是它是问题化的”。^{[5](155)}对后现代历史观念来说，历史真实的存在与否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它关注的核心问题反而是历史书写的身份政治和历史阐释的意识形态；相比传统的历史真实观念，它更加重视的却是历史话语的真实观念和文化想象的身份经验。

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无论是海登·怀特的“元历史”，还是福山的“超历史”，后现代历史话语始终无法摆脱“奥斯维辛”的历史痛楚，以及自身关于“历史终结”的文化想象。正如格氏本人强调，“真实世界、真实身体、真实痛楚的存在与否，至关重要。历史用途和文本阐释的各种传统范式虽然已经瓦解，此时它不再激发起那些教条化阐释的同样狭隘的可怜的全套节目，任何有价值的历史和文本阐释必须关注到这种差异”。^{[6](15)}虽然文化诗学显然已经意识到后现代思潮否认历史真实和沉溺文化想象的诸多理论后

果，但是它自身也是同样无法彻底摆脱历史阐释活动在时空情境和主体意识之间的潜在矛盾，它或许只能是暂时维持在历史事实和阐释效果之间的各种平衡状态，或者说是用“历史性”的“视域行动”遮蔽替代历史本身的时空结构。借用伊万斯的话来说，在“历史性”和“当代性”之间的视域融合或立场冲突当中，“构成好历史的恰恰是在于历史学家带来的各种观念和抱负，以及他们必须处理和定论的那些既尴尬又顽抗的历史材料之间的这种冲突”。^{[7](11-12)}

二、作为阐释立场的“历史性”

从“历史性”的“视域行动”来看，任何涉及历史阐释的理论话语或许都不敢妄称自身彻底摆脱研究主体的个体意识，更加无法宣扬彻底客观的阐释立场，因此，在各种“历史性”话语的思想外衣之下，纯粹的历史本质或许只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理论空想。文化诗学批评话语虽然是崛起于欧美学界的新历史主义思潮，但是它却显然不想过多地纠缠于历史再现的真实性问题和历史阐释的立场问题。它的具体做法则是在承认“历史性”作为绝对视域的同时，提倡一种“触摸历史肉身”和“感知历史情境”的主体经验和历史意识。对于历史意识的立场问题，库克斯强调：“‘历史转向’的不同叙述最终告诉我们的是作为历史主义者所知道的：文化对象的创造，包括学术作品，存在于多样的、复杂的和相互交叉的过去历史，从概念上独立但相互联系的各种历史，其中包括可能被称为文学传统或话语、政治历史、意识形态发展、传记和技术变革等等。”^{[8](7-8)}

如果说传统历史主义的历史意识主要表现为具体历史情境当中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观念，后现代的历史观念主要呈现为历史再现层面的叙述结构和阐释模式，那么文化诗学的“历史性”视域重视的则是各种历史意义的生产过程和它作为文化产品的流通轨迹。相比之下，它更加关注的历史意识或“历史转向”，并不是那些在历史再现层面的事件真相和意义本质，而是在文化生产层面的意义塑型和传播过程。正如格氏本人指出：“我的主要兴趣在于这些早期的交换活动，在于理解这些能量形式如何最初得到采集，然后加工运用，再回到它们的起源文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接触这些交换活动，没有能量开始传递和过程开始的纯粹时刻，我们至少能够重新塑造戏剧获得显著力量的各方面条件，但是它的基础是在我们自身的各种兴趣和愉悦，以及在无法被简单忽略的历史发

展动因。”^{[9][29]}由此可见,文化诗学的历史转向实际上是用文化活动的“活态历史”遮蔽和置换以往作为文化对象的“实体历史”,这种作法首先必须重视的是作为不同学科语境和阐释立场的“历史性”问题。

历史阐释活动必须关注历史学科和文化学科的不同研究语境和理论边界:历史学科重视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本质”或“实体历史”,文化学科则关注作为研究范式的“文化范畴”或“活态历史”。如同在历史真实和文化想象之间的理论差异一样,这两种研究导向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现实边界。在专业学科层面的历史研究传统虽然不断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但是仍然坚守历史客观性和“无功利”原则,拒绝承认各种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各种历史想象。对于历史学科的研究模式,正如拉卡普拉在《历史与批评》当中指出,“对于过去的重新建构,‘在它的自身层面’推定,仍然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目的是通过控制‘偏见’或‘主体偏好’做到尽可能的客观”,正是由于客观性和准确性的研究原则,“文献模式的各种部分组成职业化历史编纂学的必须条件,以至于历史学家只能面对重复出现的对于将档案研究神圣化的诱惑”。^{[10][19]}如果说历史学科重视的是文献模式的研究传统和历史厚描的阐释模式,那么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历史批评观念则恰恰相反,它在泛文化范畴和跨边界观念的理论外衣之下,全面收编和整合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资源和批评经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批评或许早就已经被淹没在泛文化批评的各种理论泡沫当中。

柯里蒙普的评价比较公允,“文化研究的工作是以其它历史置换这种物化的艺术史”,因此“岌岌可危的不是历史本身(实质上是虚构作品),而是何种历史、谁的历史、以及何种目的的历史”。^{[11][49-66]}后现代思潮冲击和挑战历史学科的宏大叙事方式和意识形态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揭露出历史书写过程的深层结构和历史阐释活动的身份政治,但是它对历史学科的解构思维却是逐渐导向一种泛文化观念的历史想象和跨学科视角的文化建构,在颠覆历史权威话语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某种多元化、片面化和肤浅化的理论陷阱。正如蒙特洛斯指出,文化诗学的历史阐释活动“致力于历史化当下语境、过去历史,以及在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过去塑造当下和当下重塑过去的双向交互的各种历史压力”,然而令人无法理解的却是他在此处特别强调的阐释立场问题,即“我们的分析和理解必须起源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性、社会性和机制性塑造的有利视角”。^{[12][23]}文化诗学的“历史性”立场并不标榜和攀比所谓相对客观和绝对事实的历史

原则,它的“历史性”视域只是表现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历史意识和情境观念,但是它的所谓“有利视角”却明显呈现出“崇尚当下”和“轻视过去”的阐释立场,以及“张扬自我”和“忽视他者”的阐释导向。针对历史阐释的生态问题,文化诗学批评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不仅是在“历史解构”和“文化想象”之间不断溢出的理论泡沫,更多的是在“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之间不断纠结的阐释立场。

三、作为效果历史的“历史性”

对于历史话语在过去事件与主体意识之间的理论困境,正如荷兰历史学家安科斯基指出,“历史书写的各种新形式也希望给予我们那种生活在过去某个特定时期‘感觉如何’的观念,因此它们主要传递的并不是只能疏离我们和经验的某种关于过去的连贯知识,而是透露给读者那些历史学家预言能够允许的足够直接和接近的某种关于过去的‘经验’”。^{[13][143]}在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冲击之下,历史书写活动已经不再被看作是追溯历史情境、触摸历史肉身和还原历史真相的再现模式,反而愈加成为研究主体在浩如烟海的文献档案当中追忆历史图景、对话过去逝者和描述历史效果的建构活动。从文化诗学的批评观念来看,与其徒劳地遥望历史真相的海市蜃楼和历史意义的虚幻空间,倒不如关注历史主体的“生活经验”和当代主体的“感觉经验”,“本质主义”的历史再现观念已经让位于当下语境的“功能主义”的历史描述模式,或者说是其“历史性”本身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

针对“历史性”作为效果历史的阐释立场,格氏专门提出“惊诧”和“共鸣”两种概念来描述不同主体视角的情感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弥补和完善蒙特洛斯关于“有利视角”的阐释观念。对于历史阐释的目标对象,格氏本人表明文化诗学“明显对共鸣具有特别的喜好”,“它对文学文本的关注是为了恢复它们原初生产和消费的各种历史场景,分析这些情境与我们语境之间的关系”;对于历史阐释的视角导向,他又强调“不是为了在艺术作品之外寻找文学阐释能够牢固链接的某种基石,而是将相关作品放置于它的历史与我们时代之间某一既定语境”;对于历史阐释的描述模式,他又指出“将这些相互交织的情境不是理解为某种稳定的和预先设置的、文学文本可以被放置其中的分析背景,而是作为由不断发展而又通常相互矛盾的社会力量组成的密集网络”。^{[6][170]}可以说,文化诗学的历史阐释活动发端于作为效果历史的文本结构和

作为历史效果的主体经验，运作在各种文本语境、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网络，呈现为不同时空主体之间的对话空间和共鸣效果。

文化诗学主张用“历史性”的阐释效果置换历史事件的意义本质，但是它却似乎没有彻底解决历史阐释活动的生态问题；虽然它同时也在提倡在不同时空语境之间的对话空间，但是实际上却是很难达到不同时空主体之间的共鸣效果。就历史阐释的具体过程而言，在历史文本的世界当中或许存在着不同语境的种种踪迹和历史主体的种种影子，但是却没有任何的直接途径去感知它们的现实存在和触摸它们的历史肉身；在当下语境当中现实存在的或许只有文本形式的历史作品和主体意识的阐释效果，同样没有直接途径去感知它们的历史情境和体验它们的时空意识。因此，仅仅凭借各种文本之间的“互文性”网络，以及各种主体之间的“间性”结构，是否能够在文本层面充分再现各种过去事件和它的历史情境，在主体层面客观代言不同过去逝者和他的生活经验？针对作为阐释效果的“历史性”本身，格氏本人也坦言：“我曾经梦想与逝者对话，甚至现在我也不放弃这个梦想；但是，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幻想我能够听到某种单一的声音，他者的声音；如果我想要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必须聆听来自逝者的许多声音；如果我想要听到他者的声音，我就必须聆听我自己的声音。”^{[9][30]}

在现实语境当中，过去逝者可能会留下各种各样的符号和文本踪迹，但是通过这种所谓的“历史声音”却根本无法接触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经验。作为当下释者的“我”想要与过去逝者对话，不管如何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管如何努力聆听逝者声音，最终收获的或许只是从不同角落传来的各种回音。历史阐释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无异于是释者本人在文本舞台的独角戏。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呈现出“历史性”话语无法回避的一种悖论逻辑：以逝者主体为阐释导向，历史阐释的共鸣观念只会呈现出文化想象的各种海市蜃楼，无法判断其是否存在；以释者主体为阐释导向，他的共鸣观念又无异于是代言他者声音的各种模仿游戏，不能对其分辨孰真孰假；同时以逝者与释者为阐释导向，他们的共鸣观念又等于是主体意识的各种自

我呓语，无法对其评价立场问题。时空共鸣的美好理想或许只能是当代主体对历史情境和历史人物的某种单相思情结，然而当下释者对过去逝者的痴迷也可能会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将自我意识彻底融入到历史情境，将自我声音完全激荡在历史回音。此处借用格氏本人的话来说，“在共鸣者内心不停的重新恢复惊诧情感是新历史主义的功能，它们的协调是通过那些建构自我、无数对象以及各种描述和分析标识的共鸣语境”。^{[6][181]}总而言之，文化诗学的共鸣观念以当下释者为阐释导向，或许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阐释活动的生态问题，反而在“历史性”的问题意识当中将它不断通向文化再现结构的各种言说边界和诗意空间。

参考文献：

- [1] 盛宁. 《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2] Mieke Bal. *Looking In The Art of Viewing* [M]. London: Routledge, 2001.
- [3] Hayden White. Historical Pluralism [J], *Critical Inquiry*, 1986(1): 480-493.
- [4] Catherine Gallagher & Stephen Greenblatt.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0.
- [5] Keith Jenkins. "Why Bother with History?", in *Reading the Past* [C]. London: Palgrave, 2000.
- [6] Stephen Greenblatt. *Learning to Curse* [M]. London: Routledge, 1990.
- [7] Richard Evans, "Introduction-Redesigning the Past"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03(1): 11-12.
- [8] Jeffrey Cox & Larry Reynolds (eds.). *New Historical Literary Study* [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3.
- [9] 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M].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0] Dominic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1] Douglas Crimp. "Getting the Warhol We Deserve" [J]. *Invisible Culture*, 1999(1): 49-66.
- [12] Louis Montrose, "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 in *The New Historicism* [C]. H.A. Veeger (ed.), London: Routledge, 1989.
- [13] Frank Ankersmit. "Historicism: An Attempt at Synthesis" [J]. *History and Theory*, 1995(3): 143-161.

On Historicity in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Poetics

WANG J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下转第 227 页)